

清代搢绅录略考

张 英 字

搢绅录，指全国官员名册一类专书，载有职衔名称并任职者姓名籍贯等项。搢绅，又作“缙绅”，见于《庄子》、《史记》，原意是把“笏”插在袍服的大带里，用作有官职者的代称。

我国建立国家管理机构，起源甚古。《尚书·尧典》记述尧“平章百姓”，舜设“十有二牧”，并委派“司空”、“后稷”、“司徒”等职，表明远在我们的先民传说中，就已经有了辨明各色官员职守以至设官分职各有所司的故事。秦汉以后，我国封建官僚制度日益完善。而搢绅录的渊源，清末沈家本在《枕碧楼偶存稿》卷六“道光五年搢绅跋”一文中论及，大意是：《周礼》御史条“凡数从政者”，指从政的人一定在简册上书名，御史掌管在职官员的人数与先后次序。《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质”一句，杜预认为策名就是为人臣者要在简册上书名。所以官府册籍中注明职官姓氏，由来已久，是古老的制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有应劭《汉官仪》一卷，记有三公的官名和姓名籍贯，连同李埴所增补的一卷，都已失传。《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何晏《官族传》十四卷，王秀道《百官春秋》五十卷，无名氏《百官春秋》二十卷，《魏晋百官名》五卷，《晋百官名》三十卷，《晋官属名》四卷，《陈百官簿状》二卷。《唐书·艺文志》

著录有陆机《晋惠帝百官名》三卷。这些书也都亡佚。但《世说新语》和《文选》的注文中，还有《晋百官名》的引文，列有名字与籍贯，似乎体例大致近似当今的搢绅录。《隋书·经籍志》称正史中的表和志，已经不再列举百官姓名，居官求仕者，有人按照官府的册籍加以编录，单独行世。南朝宋、齐以后，这样的书日益繁多，可知这种风气盛行于六朝。

据宋代洪迈《容斋三笔》的记述：“绍熙四年，客从中都来，持所抄班朝录一编相示，盖朝士官职姓名也。”这段话，是搢绅录最早的正式记载。

清代搢绅录，有官刻与坊刻之分。光绪年间李锺豫在给坊刻搢绅全书所写的序言中提到“国家设官分职，吏部刊列搢绅，按季进呈”^①，说明搢绅录每年按季刊刻，以吏部档册为依据。

吏部刊刻的官刻本，正式名称为“爵秩全览”。由于吏部只铨选文官，所以《爵秩全览》只列出各该季度的文职官员，从中央到地方，从部门首脑到最低职务的品级职衔，及正式任职者的姓名籍贯、除授日期和科甲出身。它分京官、外官两部份。京官按宗人府、内阁、翰林院、詹事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理藩院、都察院、六科各道、五城兵马司、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国子监、鸿臚寺、钦天监、太医院、銮仪卫、御前侍卫先后次序编列；光绪三十三年改革官制后，增加军机处、政务处、外务部、民政部、巡警厅、度支部、学部、陆军部、军咨处、陆军部海军处、法部、审判厅、检查厅、农工商部、邮传部、给事中、各道御史、步兵统领、八旗都统，相应取消了詹事府、户部、兵部、刑部、工部、五城兵马司、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臚寺。外官指各省及其下属各府、厅、州、县各级官员。各省次序，清初按盛京、直隶、江南、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为序；光绪朝行省更置，“盛京”后增奉天、吉

林、黑龙江，“江南”改为江苏、安徽，陕西后增列甘肃、新疆。

《爵秩全览》外官部份，还在每省府、厅、州、县之下注明一些简要情况。每省之下注有：

疆域——包括省会及其与京师的方位距离，境域广袤与四界连及的省县，所辖府、厅、州、县的总数。

职官——包括总督、巡抚、布政、按察及各道的驻地和官员总数。

赋税——包括地丁钱粮、漕米盐课总数以及藩库存留、起运金额。

关榷——列出各关额征税银及督理监收官员。

每府之下，注有四界、与京师距离、所辖州县数、知府养廉银，以及风俗、学校、土产。每县之下，注有地丁、杂税、额谷、养廉银、办公银与驿政。而每府每县下，既分别注明为“最要”或“要缺”或“中缺”或“简缺”，表明各该职务的重要程度；又大字标出“冲”、“繁”、“疲”、“难”诸字样，表明此项职务属于地理要冲、事务繁杂、吏风疲弱、治理艰难。这些简要情况，尽管内容不多，年年相因，但在一函书中，全国各地的基本面貌一目了然，类似今日的行政手册，查检方便。因此，郑振铎先生说它“是大好的清代中叶的经济史料，不仅仅记载职官姓氏而已”^②。

《爵秩全览》每函四册。没有内封面，也没有任何出版标志，封面仅有“爵秩全览”四字的题签。卷前无序言凡例等，开卷便是从“宗人府”开始的各衙门的职衔与官员姓名。但开本大，板框约15厘米×18厘米，每半页十六行，刻工较好，装璜较精。这种官刻本中还有较为难得的黄绫封面、黄绫包角、双股黄丝线装订，或者红绫封面、红绫包角、双股红丝线装订，每季装为二册，天头地脚更大。这种精装刻本的板式、版框、行款，与普通红纸封面、每函订为四册的官刻本完全相同。

光绪二十一年春季起，官刻本增刻《新增爵秩全览》二册，包括以“官阶品级”、“职官总目”、“赴任凭限”、“驿站路程”、“相见

礼仪”等居官须知为内容的上册，和列出军机处、会典馆、总理衙门、神机营等衙门的名册的下册。

由于清廷改行所谓“宪政”，光绪三十三年冬季，官刻本取消了《新增爵秩全览》下册，把《内务府爵秩全览》一册增入，但这两册的外封面仍然题作“爵秩全览”。

官刻《爵秩全览》之外，同时还有民间刻书堂号仿照官板刊售的坊刻本。坊刻本自称“遵吏部之档册，仿官书之款式”^③，但封面题签、卷端题名、内容以至装订等方面，都与官刻本不同。

坊刻本大多为袖珍本，各家书堂的封面题签颇不一致，有“满汉爵秩新本”、“满汉缙绅新本”、“大清仕籍全编”、“职官迁除题名录”种种名称。光绪朝，多数书堂题为“爵秩全函”和“大清播绅全书”，同时也有题为“皇朝文职官录”、“大清日新职官录”和“大清最新百官录”的。清廷“立宪”以后，还出现“宪政最新播绅全书”，或“大清最新播绅录”。然而，各书堂无论在封面题签上如何别立名目，内封面都一律题为“大清播绅全书”。

在内容上，坊刻本除正文部分与官刻《爵秩全览》完全一致以外，卷首还增刻有“官阶品级”、“职官总目”、“赴任凭限”，“驿站路程”、“相见礼仪”等居官须知（这部份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坊刻本自乾隆朝起就已列入，而官刻本在一百多年后的光绪二十一年春季，才把它作为《新增爵秩全览》上册收入书中。官刻本这一更动，未能查明其来由。但不难推断，这部份内容很有用处，也说明人们很不重视的坊刻本，未必毫无可取之处）。此外，坊刻本开卷便是“大清播绅全书叙”，自最早的康熙二年夏季^④至最晚的宣统三年秋季，所见各本都一致沿用。其次为“大清播绅全书凡例”，主要说明全书内容的合法根据。

坊刻本在刊刻全国文职官员名册的同时，还刊刻全国武职官员名册，封面题名“大清中枢各览”（“中枢”，是当时对兵部的别称。武职官员由兵部铨选，故名）。据目前所见，乾隆朝已经

出现。这部份内容常与文职官员名册合成一函，并在全书第一册封面上注明“某某书坊校准四季大小文武播绅”的字样，封面仍然分题“大清播绅全书”与“大清中枢备览”。

光绪三十三年秋季以后，坊刻本还新收入一册《新增直省候补同寅录》（或《大清直省同寅录》），主要是每年京官和外官候补人员名单。这一册中并增刻有“品级备考”、“气节时刻”、“西历礼拜”、“国朝纪元”、“万寿忌辰”、“初任须知”和“居官摘要”。

“西历礼拜”，是当时办理洋务所必用的简明中西历对照表。

“岁阳名异”一栏，列举纪年干支与各月份的别称。而“初任须知”与“居官摘要”，又包括了一些公文程式、赴任规则以及通禀称呼和敬避字样等。这些内容，更显示出播绅录是居官作幕人员的必备之书。尤其是“品级备考”附有“官职别称”，集中列举清代官场中各种衙门和职务的别称，是他处所不易找到而阅读清人著作经常需要的资料，如：

内阁——总称东阁、东垣、黄阁。

大学士——相国、中堂、大国柱、大柱石。

中书科——总称西掖、西省、右垣、右曹、西垣、西台、纶阁、凤掖、鸳掖、鸡省。

中书——中翰、内翰、大掌翰、大内史。

督院——总称制府、开府、都府。

总督——制军、大总制、大枢台。

巡抚——抚军、大中丞、大司宪。

各家坊刻本刻工装璜均极粗糙，而版框与装订颇为一致。红纸蒙面，贴有标示本册内容的简单目录。凡是一函四册的，内容是《大清播绅全书》，只有文职官员名册。一函六册的，是增入了武职官员名册即《大清中枢备览》二册。光绪二十一年官刻本增加《新增爵秩全览》以后，一部份坊刻本也依式增刻，封面题为“新增大清播绅全书”（现已看到最早的是光绪二十三年春季的

刊本。光绪二十四年冬季荣宝斋刻本的凡例中说明，“是书原订四本。光绪二十一年春季新增以上各衙门差使，吏部遂分为六帙。自应遵照官本，以为画一”。这样，坊刻本就出现了两种内容的六册函，即《大清播绅全书》加《大清中枢备览》，或《大清播绅全书》加《新增大清播绅全书》。此外，还出过包括三部份内容的八册函。再则，《大清播绅全书》四册附入《新增直省候补同寅录》一册或《大清直省同寅录》一册的，已见光绪三十三年秋季的刻本，这是五册函。清末改制，京师衙门增多，有的刻本把《大清播绅全书》扩为五册（如宣统二年荣禄堂刻本）。两种五册函再附入《大清中枢备览》，就是内容不同的两种七册函。总之，从乾隆朝至宣统朝一百六七十年间，坊刻本先后有四册、五册、六册、七册、八册为一函的各种形式，而册数相同的播绅录，内容未必相同。

民间书堂刊刻播绅录，明代就已经出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保存了万历十二年春季“北京铁匠胡同叶铺”刊刻的《新刊真楷大字全号缙绅便览》一卷和“北京铁匠胡同”的《新刊南北直隶十三省府州县正佐首领全号宦林备览》二卷。据曹元忠跋，前者“为内阁、詹事府、翰林院、六部以至五城兵马司，用蓝印者，皆京官也”；后者“为各省布按、经历、照磨、府州县官，用墨印者，皆外官也”^⑤。这是目前北京地区所见最早的坊刻本播绅录。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另有一部崇祯年间《新刊详注缙绅便览》，正式标明刊刻者为“洪氏劄刷斋”。从没有正式招牌字号到有正式堂号，也许正是坊刻播绅录由草创走向正规出版的反映。《桃花扇》〔迎驾〕一折有“取本《缙绅便览》来从头抄写便了”的句子，可见当时已颇为流行。

按北京地区各图书馆的收藏情况看，清代坊刻播绅录远比官刻为多。坊刻本大量出现的原因，是因为“独是官板难得，而坊刻本遂盛行于天下”^⑥。从顺治到宣统年间，刻书堂号已见下列

四十余家，括号内是所见的最早年份：

洪氏制刷斋（顺治十八年）	荣禄堂（康熙二年）
荣锦堂（乾隆十年）	同升阁（乾隆十三年）
宝名堂（乾隆三十年）	观光阁（乾隆三十一年）
崇寿堂（乾隆三十五年）	五本堂（乾隆三十九年）
世锦堂（乾隆四十二年）	荣庆堂（乾隆五十五年）
藜照阁（乾隆五十八年）	奎文阁（嘉庆元年）
贵名堂（嘉庆六年）	聚锦堂（嘉庆九年）
荣晋斋（嘉庆十年）	崇名堂（嘉庆十一年）
荣觐堂（嘉庆十五年）	荣宝斋（嘉庆十七年）
青云斋（嘉庆十九年）	荣贵堂（道光三年）
荣升堂（道光十四年）	荣显堂（道光二十五年）
圣经堂（道光二十六年）	贵文堂（道光二十三年）
富文堂（咸丰三年）	文英堂（道光二十九年）
同文堂（咸丰六年）	炳蔚堂（咸丰四年）
宝名斋（咸丰九年）	大文堂（咸丰八年）
荣福堂（同治十三年）	斌升堂（同治十一年）
宝善堂（光绪五年）	荣华堂（光绪五年）
文蔚堂（光绪七年）	文萃堂（光绪六年）
来鹿堂（光绪十二年）	松竹斋（光绪十一年）
点石斋（光绪十五年）	荣铸堂（光绪十四年）
文富堂（光绪十六年）	顺济局（光绪十五年）
文宝堂（光绪十九年）	文华堂（光绪十六年）
华记懋德堂（光绪二十五年）	善成堂（光绪十九年）
福润堂（光绪三十一年）	文采斋（光绪三十一年）
	槐荫山房（光绪三十三年）

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列举发售搢绅的书坊十八家^①，其中“崇锦堂”一家尚未见到；但孙氏未列入的其余三十一家，却无一不在封面标明“京都琉璃厂”字样。北京地区各图书馆所藏最多的，是光绪、宣统两朝的荣禄堂刻本。它原名荣禄堂，所见康熙

二年夏季的“大清播绅全书叙”，末尾所署就是这个堂号；而光绪十年后，荣禄堂刻本序称从荣禄堂改名。直到民国六年秋季它还印售过播绅全书，前后达二百五十余年。

播绅录是研究清史的一种有用的重要的资料。有些问题，其他清代史料不易解决，它特别显出其特殊价值。

这种书本来是用于考查某年某季担任某一职务的官员姓名和简历的。例如前文提到的沈家本，光绪三十四年夏季任法部右侍郎兼修订法律大臣，从《大清播绅全书》中可以查到：“字子懋浙江归安人，癸未进士”。在当今的研究工作与图书馆编目中，这种查考仍然经常需要。清代文献中，如果原记述提到某一时期担任某一职务的某人，或者用的字或别号，甚至有时只有职衔，利用当时的播绅录，就能很容易查到姓名。列出姓名的，也可以查到籍贯、出身以及到任年月。没有署明作者姓名，但提到本人的经历的清人著作，通过播绅录也可以确定著者姓名。

另外，我国的地方志中，大都有地方人物传记，包括本地出生的、或者曾在本地作官、或者居住过的知名人士。一般来说，凡是稍有成就的人物，可以通过方志找到他们的传记。这些传记大多没有收入正式史传或传记汇编，现今又还没有明清方志传记索引可查，因而凡是曾经居官的人物，通过播绅录查到他们的籍贯，进而就该省府、厅、州、县的方志中，可能会寻找到他们的传记。

从一个季度的播绅录来看，它是反映清代政府机构和一些社会经济情况的简要情况。利用这些资料作一些全面研究，比通过其他史料要远远省力。例如在不少府、厅、州、县下，有的注明“驿马×××匹”，“驿夫×××名”，有的注出“河驿”或马驿站名，某些县专设驿丞。利用这些资料，不难搞清全国驿丞驿夫的编制、驿站的布局、驿马的配置，还可能画出一份驿路图。

清代播绅录毕竟是根据吏部档册的政府出版物，具有较高的

准确性。即使是坊刻本，也在官场中大量出售，说明它能够适应当时的需要，决不能由于坊刻的粗劣外貌而不予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搢绅录可以认为是当时的记载，应该比后人追记的笔记以至编纂的史书，更接近于实际。它可以算是清史研究的一份珍贵的档案资料，应该充分加以利用。

由于工作需要，此次在北京地区十五所主要图书馆查阅了清代出版的搢绅录全部收藏，初步获知这种书在京藏有最早为顺治十八年最晚至“宣统四年”上百函数千册。光绪、宣统两朝仅缺光绪二十六年冬季，乾隆十年至同治朝颇有残缺，乾隆十年以前几乎未见。另外，琉璃厂中国书店还收有百余册（主要是光绪、宣统两朝的）。要把历年各季的搜集齐全，在北京地区大约是做不到的。同时，大量的坊刻本中，也许有装订错误以及书贾作伪等原因出现的张冠李戴，一时不易判断；少数藏本尚未查明它的年份或季度。而各图书馆所藏，有的已属孤本也未加保护，有些馆没有编号，有的甚至未正式上架。

长期以来，清代搢绅录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使用它的人不多。我们希望，最好由有关部门组织专门人员进行搜集研究，整理出一套最全最好的底本，或影印，或缩微，使这一套资料在学术研究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注

①见松竹斋、荣宝斋光绪十九年合刻本。

②见乾隆四十二年《大清搢绅全书》，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

③见宝善堂光绪七年冬季刻本。

④荣禄堂宣统三年夏季刻本所冠旧序，在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曾见此本。

⑤见万历十二年春季《新刊真楷大字全号缙绅便览》，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

⑥见松竹斋、荣宝斋光绪十九年合刻本。

⑦见《琉璃厂小志》，第186页。